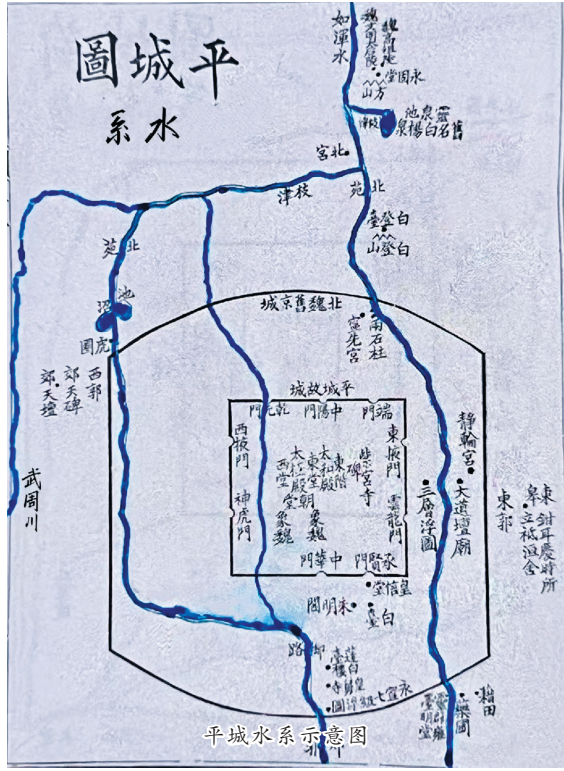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北魏平城都

## 《时间隧道中的大同古城》之一(节选)

李尔山 刘艾珍



**8. (水系)**北魏平城的水系,不仅是维系都城生存与繁荣的命脉,亦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,在入主中原进程中至关重要。此水系巧妙融合自然河流与人工渠网,构成一套复杂而高效的系统,堪称中古以前大型都城水利工程的典范。平城水系之骨架,由《水经注》所载两条河流支撑:源出北山的如浑水(今御河),与自西山而来的武周川水(今十里河)。如浑水作为城东干流,穿郭城而过,流经官城东侧,主导城市生活、南郊灌溉及东苑供水;武周川水则凿渠引向西北,然后亦向南穿行,成为西苑、鹿苑、北苑及官城西部的核心水源。

迁都之后,北魏王朝对自然水系展开大规模改造和整治,形成“引、注、分、绕”的立体水网。《魏书·太祖纪》载,天兴二年(399年)“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……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,疏为三沟,分流官城内外。又穿鸿雁池”。此乃平城最早、最关键的水利工程——沿西北山脚凿渠,引武周川水入苑,再疏为三沟,构建起城市西北部的自流供水网络。该体系既满足鹿苑的南部景观与畜牧之需,亦分流官城内外,为宫廷及周边区域提供生活与消防用水。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曾载北魏官城初建时“门不施扉,城又无堞”,形制简朴,未设壕堑。然而至《水经注》时代及后世研究皆表明,官城四周已有水流环绕,兼具防御之功与漕运之便。与此同时,如浑水亦经人工疏导,其枝津被引入北苑,汇灌凉凉之北、红娘之南的清泉,改造白杨旧泉而为著名的灵泉池,成为皇家游赏的核心水域。由此顺流而下,永兴五年(413年)二月开凿鱼池,泰常元年(416年)十一月筑蓬台,至泰常四年(419年)台上宫殿(白楼)竣工,遂使都城东部内外碧水如带,化为时人向往的“蓬莱仙境”。郦道元云:“南面旧京,北背方岭,左右山原,亭观绣峙,方湖反景,若三山之倒水下”。

价值称道者,在于平城水系并非孤立存在,而为一有机整体:一是水源互补:西有武周川水,东有如浑水,双流并济,共为城市命脉。二是功能分区:武周川水系统,偏重西苑、鹿苑与官城西部,服务于宫廷及里坊日常;如浑水系统则主司北苑、东苑与郭城东部之园林、生活,并承担南郊农耕灌溉。三是水网互通:凭借人工渠系,将东西二水



连为一体,于官城、苑囿与里坊间织就密布水网,终在城南合流,南注桑干。四是因势利导:平城位在西北高东南低的缓坡面之上,河渠亦因其地势,畅而不滞。旱时以自然溢流而用其利,洪涝之际则开闸泄其害。此一宏大水系网络,实为北魏王朝维系百万人口大都运转,并营造辉煌园林之根本保障。其规划与实施,亦充分展现出北魏国家卓越的工程组织能力与宏阔的都城营造视野。

**9. (道坛)**北魏开国之初,为调和胡汉矛盾,奉行佛道并用的国策。道武帝晚年“好《老子》之言,诵咏不倦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,其尊道立场,为后世诸帝所承袭,明元帝时期,“泰常三年,为五精帝兆于四郊,远近依五行数,各为方坛四陛,埽坛三重,通四门。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。遥祭黄帝,常以立秋前十八日。余四帝,各以四立之日”(《魏书》卷三·《太宗纪》)。“五精帝”即东方太皞伏羲氏、南方炎帝神农氏、西方少昊金天氏、北方黑帝颛顼氏、中央黄帝轩辕氏。其祭祀之说,约始于汉之谶纬之学,故亦为早期道教所推崇。泰常三年(416年)北魏朝廷举行此类祭天活动,说明其受早期道教影响是不争的事实。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,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刻了。泰常八年(423年),明元帝崩,太武帝即位。嵩山道士寇谦之携其所造《录图真经》北上平城,宣称得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亲授,意图重振北方道教。他献上《云中音诵新科之戒》二十卷,提出一套契合帝国统治需求的教义改革,经重臣崔浩极力举荐,终得太武帝“青昧”。

北方天师道的春天由是而至。太武帝尊寇谦之为“国师”,新天师道在朝廷支持下臻于极盛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:太武帝“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,祭嵩岳,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……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,遂起天师道坛于京城之东南,重坛五层,遣其新经之制。道士百二十人衣食,齐肃祈请,六时礼拜,月设厨会数千人。”此条明载,平城东南之道坛,乃寇谦之抵京后由国家敕建的最高规格官方道坛,享有国家俸给编制。其始建时间,当在寇谦之初至平城的始光年间(424-428年)。据载“其庙阶三层,四周栏槛,上阶之上以木为圆基……上圆制如明堂”,属典型坛式建筑。关于其址,学者力高才据《水经注》考定于如浑水东,今冯家堡、曹夫楼一带。除斯坛外,京城另建有静轮天宫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谓“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,欲上与天交接,功役万计……”。寇谦之曾奏言:“今陛下以真君御世,建静轮天宫之法,开古以来,未有之也。应登受符书,以彰圣德。”意在使太武帝以“太平真君”身份临御天下,奉天师道为国策。故可推知,静轮宫之兴建,当在太平真君年号初启(440年)之后。其位置,亦采信力高才所考,位于前述道坛东北之牛庄一带。关于形制,郦道元称其“台榭高广,超出云间”,然在当时物力条件下,此“欲令上延霄客,下绝尘嚣”之构,实属宗教狂想。静轮宫终于在太平真君十一年(450年)被毁。

道教是与大自然联系最紧密的宗教,寇谦之除了推动朝廷在京近建立宏大道坛之外,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机构的建设亦在其盘算之中。《魏书·礼志四》载,太延元年(435年),北魏朝廷正式“立庙于恒岳、华岳、嵩岳上,各置侍祀九十人,岁时祈祷水旱,其春秋泮泮,遣官率史祭以牲牢,有五岳。”这就是说,在太武帝时代,北岳恒山上确定无疑地存在道教的祭祀机构。这是一个带有90人编制的“侍祀”常设机构,“岁时祈祷水旱”,“春秋泮泮”时节,专伺皇帝或朝廷派专员来举行祭祀北岳大典。由此联想到北天师道当时进行的是

次以“音诵”之名整顿教团的改革,所以,我们有理由相信,今恒山脚下浑源县城北神溪湿地那座名为“律吕”的祈雨神祠(始建于北魏),就是当年“恒岳”朝廷侍祀庙建的山下部分。

我们不能不说,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在皇帝拓跋焘和重臣崔浩的加持之下,来得太过“猛烈”了。致使这场改革的思想成果,被意外引发的血腥的灭佛运动所完全覆盖。其结果是人人共知的。先是“太武灭法”(444年),后是“文成复法”(460年),政治变脸,弹指之间。不光佛教横遭劫难,僧人或死或逃,风吹云散;皇太子被诬谋反,忧郁而终;道教亦遭冷落,星冠弹落,寇谦之的寂寂故去;崔浩亦未幸免,突陷“国史碑案”,惨遭灭族……在公元5世纪的历史逻辑之中,或许只有一个例外:大劫43年后——太和十五年(491年)这一年正是孝文帝拓跋宏“建明堂”、“改太庙”,进行汉化改革最关键的年份。平城东南的大道坛也飘来一纸诏书:“夫至道无形,虚寂为主。自有汉以后,置立坛祠,先期以至顺可归,用立寺宇。晋京城之内,居舍尚稀,今者里宅栉比,人神猥杂,非所以祇崇至法,清敬神道。可移于城南桑干之阴,岳山之阳,永置其所,给户五十,以供帝祀之用,仍名为崇虚寺。”(《魏书·礼志》)此诏中对于平城人居情况的描述,与我们在上文“里坊”节中用数据推演出的数据恰是一种相互印证。当然也可能存在道教失宠失势的因素在内,但无论如何,在静轮天宫消匿之后,曾经大红大紫的道坛也与大都会告别了。历史的结局常常是前因的悖论,经各路专家的考证,迁到恒山中的道坛(崇虚寺),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建筑巨珍悬空寺。虽然仅存此一脉,但峥嵘而崔嵬,犹显其“欲绝尘嚣”狂想中的风采。



云冈石窟石雕艺术

**10. (佛寺)**与道教相较,佛教在北魏平城的历史中虽曾付出沉重代价,然其主导意识形态之时期更长,所创造之物质与精神文明亦更为恢宏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,道武帝于定策迁都之始(天兴元年,398年),便下诏申明国策:“夫佛法之兴,其来远矣。济益之功,冥及存没。神踪遗法,信可依凭。”遂“赦有司,于京城建塔容范,修整宫舍,令信向之徒,有所居止。”当年即“始作五级佛图,普闍崛山与须弥山意象,以“五级佛图”为核心的“塔主式”佛教寺群,而绝非事急从权的草率之作。据此可推知,当时应诏而至的河北高僧法果(为首任“道人统”),或曾驻锡于兹,甚至主持过此寺建设。正是此段因缘,缔结了拓跋珪与法果间的政教同盟,孕育了“皇帝即是如来”的北魏佛教政治理念,自此改写了中国汉传佛教之进程。关于五级寺址,已故学者脱克先生据清初茅世膺碑记“今华严寺,北魏时就建有寺院”,推测其即后世华严寺前身,笔者从之。

拓跋珪与法果所奠定的政教同盟,作为北魏王朝之核心遗产为后世诸帝所承袭(太武帝前期亦崇佛)。若论其物质遗存,平城时代予后世最宏大者,莫过于云冈石窟。云冈之凿,始于文成帝和平元年(460年),然思想和技术准备早已展开。兴安元年(452年)复法后,文成帝即诏令“有司”,在道人统师贤(古代印度闍宾王族出身的僧人)指导下,模仿皇帝相貌(“令如帝身”)雕凿石像。像成则“面上足下,各有黑石,同帝体上下黑子”,时论以为诚感。至兴光元年(454年)秋,更敕令于“五级大寺内,为太祖以下五帝,铸释迦立像五,各长一丈六尺。”待此义理与技艺储备完成,旷世工程方正式启动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:“和平初,师贤卒,曷曜代之,更名沙门统……曷曜五

所,铸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,次六十尺,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”此即云冈一期“昙曜五窟”。伟大的云冈石窟,迄今已历1560余载,现存主要洞窟45个,造像59000余尊,乃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。其本质是国家佛教“复法”之宣言,亦即“皇帝即如来”理念最宏阔的体验场,和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直观展示区。其显著特质在于纯粹的皇家工程属性:以举国之财力,云集之役匠,加持着西来法驾、东润佛雨,建一座石壁上的佛国。主体工程集中于文成帝至孝文帝迁洛前(460-494年)的三十四年间。其艺术灵魂,融古希腊之写实、印度佛教之哲思与华夏王朝之气度于一体,磅礴瑰丽,无与伦比,亦深刻体现了北魏王朝于文明、乐于融合的国家意志。

云冈工程贯穿文成、献文、孝文三朝。其间,文明太后冯氏作为北魏前期改革的主导者和石窟建设的关键推动者,深刻影响了这一历史时期。皇兴五年(471年),献文帝禅位于幼子孝文帝,此实为冯太后主导的权力和平转移。逊位后的献文帝(太上皇)移居北苑崇光宫,朝廷依其“雅薄时务,常有遗世之性”,特于苑中西山为其建造鹿野石刻佛图(今大同城北鹿野苑石窟),以供清修。此亦属皇家石窟系统,可视作文成之余脉。

自文成复法,北魏全域佛教迅速升温,尤以平城为甚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,至孝文帝太和年间,“平城内外寺院已近百所,僧尼二千余人(全国寺院计六千四百七十八所,僧尼七万七千余人)”。其时都城,除武周山石窟外,殿塔林立,其中永宁寺尤为翘楚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载,皇兴元年(467年)八月,“起永宁寺,构七级佛图,高三百余尺,基架博敞,为天下第一”。永宁寺七级佛塔,堪称平城后期最宏伟的佛教建筑,亦是承袭汉魏楼阁式塔形制的典范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灤水》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:“京邑帝里,佛法丰盛,神图妙塔,架峙相望,法轮东转,兹为上矣。其水(如浑水)俱南绕城,西出郭外,水西有祇道舍,并诸窟室,比丘尼所居也。其水又南,径藉田及药圃西、明堂东。又南径皇舅寺西,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,有五层浮图。又南径永宁寺七级浮图西。又南远出郊郭。又南注于灤水。”郦道元的描绘再现了当时平城内外“神图妙塔,架峙相望”的佛教昌盛气象。其中特别提到了由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“皇舅寺”中的五层浮图和永宁寺的七级佛塔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(据此可知两寺两塔均在平城郭城东南)。反映出北魏后期,皇家,外戚勋贵积极参与建寺,推动了平城佛教全面繁荣的局面,史料价值异常珍贵。

**11. (明堂)**北魏平城礼制建筑之营造,始于道武帝南郊祭天,而极盛于孝文帝太和年间之全面鼎盛。此番革新,由内而外,贯通官城与郊野;于内,度立宫阙,确立新制;于外,创筑明堂,订立郊礼。二者共同构成了北魏在迁都洛阳前,于其根本之地完成华夏正统转型的终极空间宣言。

宫城内部的变革,猛烈而彻底。太和十六年(492年)二月,孝文帝下诏“坏太华殿,经始太极殿”。拆除旧日正殿太华,在原址兴建象征宇宙秩序的太极殿,并附建朝堂及东、西堂。此举绝非简单的宫殿更新,而是以儒家经典理念重塑国家权力核心的空间革命。紧随其后,宫城城门制度亦得以完善。太和十六年于宫城夹建中华门、承贤门、云龙门、神虎门、乾元、中阳、端门等九门。特别让人欣喜的是,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中的《平城图》中明确标注了这宫城九门。前二门:中华门(正门)、承贤门(东偏门);东二门:云龙门、东掖门;西二门:神虎门、西掖门;北三门:乾元门、中阳门、端门;终让平城都城城垣体系的城门系统有了浓墨重彩的结笔。当然还留有遗憾,那就是外郭上的十二门终无定论。传为:建春门、东阳门、南侧门(名称不详);开阳门、平昌门、朱明门、中端门;雍门、中部门(名称不详)、金肃门;广德门、大夏门。因无可靠出处,终不敢轻信,权列于兹,留作备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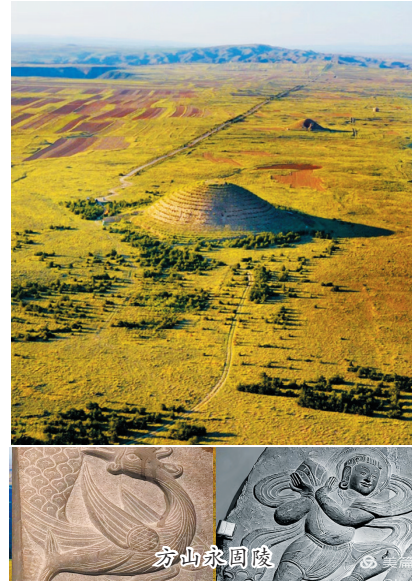
当宫城中枢焕然一新之际,南郊礼制区的宏大工程亦同步达到顶峰。其核心即为辟雍明堂。太和十五年(491年)四月,孝文帝下诏“经始明堂,改营太庙”。面对古制湮灭的争议,拓跋宏采纳中书令李冲之议,以“去都邑之中心,测景(影)之中”的科学方法,于都城南北中轴线上定位明堂,其制“上圆下方,引水绕道”。太和十六年正月明堂告竣,孝文帝即“亲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,以配上帝”。至此,明堂“祭天配祖,象天布政”的国典地位已完全回归中原古制。拟江河之纬,环辟雍而制



大同北魏明堂(新建)

形,与明堂二位一体,构成完整的礼制建筑群。而在此南郊宏构之前,象征文化学统的国立孔子庙已于太和十三年(489年)率先完成于“京师”(具体位置失考)。同时将“中书学”更名为“国子学”,在体制上奠定中央教育体系之基础。此乃中国历史上首次于都城敕建国家孔庙,其意义之深远,不亚明堂。

纵观太和至十三至十七年这关键五年,孝文帝的营造活动呈现出清晰的文化战略布局:太和十三年立孔庙,树立文教正统;十五年始建明堂太庙,立天地祖考之礼;十六年成太极殿于内,健全君臣公府之制;十七年建九门于官城,终完皇都之体系。这是一个从意识形态(孔庙)到礼仪核心(明堂)再到权力中枢(宫阙)与都城框架(城垣)的系统性、全景式的都城改造。最终,中轴线上,崭新的太极殿朝堂与南郊的明堂辟雍,一内一外,构成了北魏平城晚期都城的“双极”:一极是人间的政治中极,另一极是通天的礼制圣地。它们与同期确立的“九门”官城以及“十二门”外郭格局共同宣告,平城已完全褪去草原都城的历史色彩,成为一座符合华夏礼乐文明理想的“天子之都”。孝文帝“宅中土”的抱负,正是在这片土地上,通过这片空前绝后的营造,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。



山西云冈石窟

**12. (陵墓)**鲜卑之族葬俗尚俭,自来山陵沉寂。“金陵”之名,虽见于史册——如,道武帝天赐六年,“葬盛乐金陵”;明元帝永兴二年,“葬云中金陵”……但“金陵”二字仅泛指指云,实与汉地皇陵,取义相殊。然而,自定都平城后,改革之风,渐吹渐劲,陵寝之制也鉴汉俗,亦步亦趋。平城时代最显赫之皇家陵寝,不在帝王,而在临朝称制、推动江山鼎革之文明太后冯氏墓,名为永固陵。

永固陵,择于方山(今大同北寺儿梁山)。《魏书》载,太和五年,“陵寝始建,太后亲携孝文帝登临山阜,视度万载之所”。其格局,已全然汉家气象:陵园呈方

形,设思远佛寺于前,石阙祭殿遗址犹存,冢丘巍然,至今残高高达二十余米。地下玄宫虽未发掘,然据《水经注》载:“庙前筑石为碑、兽,碑石具在”,可见其规制崇隆。最可注目者,乃陵园与佛寺一体规划,佛教建筑纳入皇家陵制,此为北朝首创,映照太后崇佛与汉化并举之胸襟。永固陵不仅为山石土木,更是文明太后一生功业之丰碑:自献文帝时临朝听政,至太和十四年崩逝,二十余年间,她以铁腕与明睿,重塑北魏江山;政治上:整饬吏治,严惩贪腐,“罢诸州暴贡”,颁行俸禄之制;使北魏始有官制典章。经济上:行均田令,计口授田,使游牧之民安于稼穡;弛山泽之禁,督课农桑,“农民布于田垄,桑妇勤于纺织”。平城官室街衢,多在其时完备。罢关津之禁,促商旅之兴;建明堂、辟雍、灵台,摹洛阳而制礼作乐,故谥号为“文明”。冯氏之治,实为孝文帝全盘汉化之先声。其陵墓坐北朝南,遥望中原,似喻示着北魏王朝将从代北走向河洛的历史轨迹。

太后既歿,孝文帝于永固陵东北一里,自营寿陵,号“万年堂”。其家略小,亦为砖砌,形仿永固陵而稍俭。此或是孝文帝初时愿为祖母“长侍山陵”之愿的见证。然而历史洪流终不可逆,太和十八年,孝文帝决意南迁,平城陵域自此再无新家。“万年堂”竟成平城时代帝王陵墓的终结,而“万年”之愿,亦随南迁之诏,化作塞北长风中的一声叹息。自官寿陵,万年前,深深镌刻进时间的岩层。平城的故事,或许随着宫阙冷落而告一段落,但它的尾声却在南迁的烟尘里,在边镇重燃的烽火中,在后代文人墨客的追忆间,延绵成一首苍茫的挽歌,低回着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的永恒慨叹。

北魏平城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,但它所奔赴的民族融合精神却与世长存!



云冈石窟山舍水殿